

河南人民出版社 ●

季音◎著

风雨 伴我行

——一个老记者的回忆

季音◎著

风雨 伴我行

一个老记者的回忆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雨伴我行——一个老记者的回忆/季音著, - 郑州:河南人民出版社, 2003. 6
ISBN 7-215-05182-X

I. 风… II. 季… III. 季音 - 回忆录
IV. K825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6291 号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 电话:5723341)

新华书店经销 黄委会设计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7.375

字数 185 千字
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15.00 元

► 自序

这本集子,记述的是笔者在半个世纪的新闻工作生涯中,风风雨雨,艰难跋涉的几个片段。在过去的几十个春秋里,我走过了硝烟弥漫的战场,目击了众多社会大变革年代感人的历史场景,也经历了种种的险棘与困厄。“往事依稀浑似梦”,这些事,似乎已经很遥远了。但这次我在重新回忆、整理的时候,不觉又一件件活生生地再现在我面前,我仿佛又回到了风风火火的当年。

二十世纪是战乱频仍的世纪。我经历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,十余年间,中华大地遍地烽烟,人民饱受苦难。在三年解放战争中,我做了三年战地记者。最初,国民党当局挑起了内战,我是怀着失去和平生活的惋惜心情愤而走向前线的,我并不深切了解这场战争的实质。以后,我在河南等地的采访中,目击了人民在国民党暴政统治下的深重苦难,特别是像临颍的大灾荒、黄泛区的悲剧等,使我惊骇,也促我醒悟。我至今依然清楚记得,临颍城关几个劫后余生者涕泪交流的控诉,禹县城外杀人坑边撕裂人心的号哭声……这些铁的事实告诉我,这个血淋淋的旧世界,怎能让它继续存在,把它彻底推翻是理所当然的。战争教育了人民,也锻炼了人民,包括我这个记者在内。

我希望读者们,特别是年轻人,读一读本书《多灾多难的河南》一章。这是我在河南战地采访中获得的第一手材料。重温一下过去





这页沉重的历史，相信对读者们会有些启迪。

在本书的后边，我写了自1958年以来的20年辛酸岁月。在写这段往事的时候，我的心情很不平静，一再搁笔。可是，这是历史事实，既不能回避，更不应该忘却。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页令人揪心的历史告诉年轻一代，让他们知道，“左”的错误曾经给他们的前辈带来过何等的痛苦。现在在不少叙述历史的重要讲话和文章里，对包括“文革”在内的这页历史只字不提，仿佛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这类事，这未必明智。古人说过：“温故而知新。”只有认真地进行历史的反思，牢记过去的经验教训，才能更好地开创新的事业。历史不是一团泥巴，可以随意捏合的。历史就是历史，既不能增加，也不能减少。我们应当如实地把历史告诉人民，特别是对缺少历史知识的年轻一代。

命运把我推上了记者岗位。说实话，最初我多半是从个人喜好出发，并不了解记者这个职业的分量。以后才逐渐懂得，记者的笔，既可以造福于社会，也可能给人民带来灾难。20世纪50年代“大跃进”时期，有些记者把满篇的假话拿到报上发表（当然责任不全在他们），亩产几万斤粮食的谎言，把人糊弄得晕头转向，给国家带来严重后果，这就是个沉痛的教训。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，他在记者活动中，务必要讲真话，写实情，主持正义，鞭挞邪恶，依仗新闻媒体的特殊功能，反映人民的呼声，推动社会进步。这样，记者也许会受到考验，受到冲击，甚至为此而付出很大代价。确实，历史上此类事屡见不鲜。不过毕竟时代在进步，人民已日益觉醒，我们的前途是大可乐观的。

我在这本集子里所写的，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。今日，我国吸取历史的教训，正在走上依法治国的正确道路，相信我所经历的20年的坎坷命运，不会再降临到同行们的头上。

本来，我今年已经七十有九，理当安度晚年，何必再费神去梳理那些早已逝去的往事？可是，我的亲人和朋友一再鼓励我说，你这个人的一生遭际，作为一个记者，颇有些代表性，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

命运不可分,这页历史任其湮没有些可惜。我觉得言之有理。好在离休下来以后,有的是时间,于是就一章一章地写了下来。这本集子真有什么对人们有益的东西吗?这只能让读者去评说了。

一位哲人说过:“一个人的悲剧,往往是一个时代的悲剧。”我的几十年遭际,说不上是什么悲剧,只不过是风风雨雨的人生旅程中的一些曲折。但从这些曲折中,读者或许多少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侧影。

季 音

2002年12月15日



目 录

YIGEJIZHEDEZUJI



一	从曹娥江边走来	1
二	第一次被逐出报社	5
三	被囚上饶集中营	11
四	越狱记	36
五	踏上战地记者之路	61
六	随军走中原	84
七	在多灾多难的河南	124
八	战火中渡长江进南京	155
九	卷入反右派漩涡	163
十	在劫难逃	187
十一	苦涩的干校八年	195
十二	喜迎改革春风	211



从曹娥江边走来

我的家乡浙江省上虞市有条美丽的江。她有个美丽的名字,叫曹娥江。这是一个姑娘的芳名。据《后汉书·孝女曹娥传》载:曹娥是东汉时会稽郡(即今绍兴)上虞县人,相传其父五月初五端午节迎神,不慎溺死江中,尸骸流失。曹娥时年14岁,沿江号哭数昼夜,投江而死。后人为纪念她,把这条江命名为曹娥江。

曹娥江原是浙江最大的江河钱塘江的支流。在我少年时,江面宽阔,来自上游东阳、嵊县的江水由南而北,滚滚流过上虞县境,汇入杭州湾。曹娥江在一年的多数时间里是妩媚而安静的,江底全是柔软的细沙,夏天是理想的天然游泳场。我在江边沙滩上捡拾闪光的贝壳,还从泥沙底下挖出一只只的小螃蟹。晚上是捉螃蟹的最佳时间。提一只小灯笼,放置在沙滩上,不消一会儿,一群群的小螃蟹便会朝着灯光爬来,成了你的俘获品。夏天的夜晚,曹娥江上空繁星满天,江面上寂静无声,沙滩上捕蟹的灯光四处闪闪烁烁,时隐时现,煞是好看。我在沙滩上玩得热了,便脱掉衣服,纵身跳进水中,打几个“水闷子”,真是惬意极了。

在雨季时,曹娥江有时变得很狂暴。雨下个不停,上游嵊县等地山洪暴发,于是一片浑黄的江水汹涌地奔腾而下,水上不时漂来草垛、桌椅等杂物,有时还有淹死的猪、羊,看来山区的农民又遭殃了。





大水漫到了我的家乡百官镇,连街上也进了水。我光着脚站在江边的高坡上,眺望江面上滚动着一团团白沫,江涛如同一群发怒的野兽向北奔去,我不禁心里纳闷:这安静的曹娥江,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凶恶了呢?

曹娥江最使我神往的,是农历八月十六日的观潮。世人都知道著名的钱塘江大潮,它被称为世界上的八大奇景之一。殊不知我家曹娥江的大潮,也十分壮观。每年的这一天,还未到中午时分,江边已黑压压地站满了观潮者,等候惊心动魄的场面降临。大约中午12点,平静的江面开始涌起微波,天边的地平线上,出现了一匹巨大的白色长练,又像一座突然隆起的山脉,在向这边移动。“大潮来了!”有人叫了一声,这时停泊在江边的船只,便纷纷迎着大潮疾驰而去,穿着白色紧身裤褂的水手们站立在船头上,挥舞着木桨,大声吆喝着,一个个就像奔赴战场的壮士。很快,白色长练变成了轰轰如雷鸣的巨浪,排山倒海似的涌来,这些船只全被卷进了大浪中,一忽儿抛到浪尖,一忽儿沉到了水里,奇怪的是没有一只船被掀翻的,当船只被大浪抛到半空的时候,那浑身湿淋淋的水手依然紧抓木桨,屹立在船头,我分明瞧见,水手们的脸上还露出得意的笑容呢!这情景,简直看得我入迷了。如今,人们都称道西方人的冲浪,其实,这东方式的冲浪,不是更胜一筹吗?

大潮轰轰地远去了,那些船只仿佛从水底里钻出来似的,都一艘艘浮出水面,安然驶回,江边的观众以称赞的眼光,迎接胜利归来的英雄。

很早以前,我的家乡人缺乏现代科学知识,以为八月大潮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神力在起作用,于是每当大潮来临的这一天,便在江边备置香烛祭品,鼓乐齐鸣,叩头礼拜,祈求苍天保佑平安。往后,科学知识的启蒙,使他们开始懂得了,钱塘江的大潮和曹娥江的八月大潮,是月亮和太阳的吸引力,在当地的特殊地理条件下形成的一种自然现象,并非神力使然。它既夹带着可怕的破坏力,又蕴藏着巨大的能量,是可以被认识、被征服的。科学驱除了愚昧,从此在我的家乡迷



信活动逐渐消隐,大潮到来的农历八月十六日,变成了欣赏大自然奇观的喜庆节日,也为勇敢的水手们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良机。

乡亲们告诉我,那些常年生活在曹娥江上的水手都谙熟水性,他们知道,如果不是驾着小舟去主动迎接大潮,而是躲藏在江边,一旦大潮涌来,这些船只就会被迎面扑来的巨浪击得粉碎。

我打心眼儿里佩服那些善于驾驭风浪的曹娥江上的英雄水手,他们也使我从中悟出了一点人生哲理:面对汹涌的潮水,不论是自然界的大潮,还是社会生活中的“大潮”,你千万不能胆怯,如果要不被潮水所吞没,就要像那些水手们那样,勇敢而沉着地迎向大潮,在搏斗中掌握潮水的规律,进而从容地驾驭它,做一个真正的弄潮儿。这也许是我少年时上的第一堂哲理课。

1940年,我离开家乡,投入了那时正席卷中国大地的怒潮,即抗日战争。命运把我推上了新闻工作岗位。我按照曹娥江水手们给我的启示,勇敢地迎接生活的挑战,不胆怯,不回头。然而,社会生活中的大潮,毕竟比自然界的潮汐复杂千万倍,驾驭它又谈何容易。我在往还泅游中几度沉浮,有多次险些被恶浪所吞噬。生活证明,我够不上一个善于驾驭风浪的弄潮儿。不过,我是一个幸运者,每当我被大潮打得晕头转向,甚至即将灭顶的时候,总是有一只只热情有力的手向我伸来,把我拉出险境。我永远感激这些好心的同志和朋友。当然,我在生活中也遇到过另一些人。他们以“革命者”自居,以整人为己任,一旦气候有利于他们,便使出浑身解数,恨不得把你打入地狱。这类人为数极少,而且他们多半事与愿违,因为真理不在他们手上。

星移斗转,岁月匆匆,半个世纪过去了,当年的莽撞小伙子,如今已是年过七旬的老者。前几年,我有机会重返久别的故乡。曹娥江变了,我的故乡上虞市变了,昔日的贫穷与落后已不再见,出现在我眼前的百官镇是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,江面上矗立起了两座雄伟的大桥,农村里处处小楼幢幢,人们生活得安逸而初步富裕。上虞市如今是全国百强县级市之一,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教科技事业都走在全

国的前列。我久久地站立在儿时嬉戏过的曹娥江边,俯视着江面,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气势磅礴、汹涌澎湃的大潮,正奔向浩瀚的杭州湾。

社会在进步,生活在前进,历史的大潮不可阻挡。这使我这个退伍多年的新闻老兵,感到无比的欣慰。这不就是我与许多战友们当年所梦寐以求的吗?当然,回顾逝去的数十年岁月,也不禁感慨万千,昔日走过的道路,是何等崎岖不平!眼前出现的巨大变革,是多么来之不易啊!

俯瞰着汨汨北流的曹娥江水,我坠入了往事的回忆……



► 二

第一次被逐出报社

我的新闻工作生涯开始于家乡一张小报——《上虞报》，当时我16岁。

那是1939年的事。当时抗日战争的烽火已燃烧到东南沿海，社会上沸沸扬扬，加上家境贫困，我也无心再继续上学读书，急于投身社会。正巧，那时我认识了一个把我引上革命之路的青年，他叫陈树谷，比我年长6岁，是个地下党员（后在苏北牺牲）。一天，他对我说：“把你介绍到《上虞报》做事好吗？”他说他有个亲戚在报社担任主笔，安排一个工作大概没问题。进报社？我头脑里嗡地一下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尽管《上虞报》只是本地的一张四开小报，在我心目中，它却是一座巍峨而神秘的宫殿，我能跨进这座大厦吗？只读了7年多书的我，能对付得了如此复杂的工作吗？但我还是感激地对他点了点头。

几天后，陈树谷带我前往几十里外的丰惠镇，当时这里是县城所在地，上虞报社就设立在这个镇。一路上，树谷告诉我，他的亲戚叫胡师柳，是著名文化人胡愈之的弟弟，他在《上虞报》担任主笔（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总编辑），我此去是拜他为先生，做他门下的一个练习生，也就是学徒。树谷叮嘱我，到报社工作后，要听胡先生的话，做事要勤快努力，小心谨慎，空余时间要抓紧学习，多读点书。





到县城已是下午三四点钟。报社是两层小楼，编辑部设在楼上。树谷把我带进二楼的一个小房间，这里就是主笔和副主笔的办公室。胡师柳先生已经坐在那里，树谷把我介绍给他，简单地说了几句，就要我对胡先生行拜师礼。那时候，师傅收徒弟是要行大礼的。我跪倒在地，叩了几个头，叫了一声“胡先生”。

“行了，行了，快起来。”胡先生笑着边说边把我拉起来。我这才看清，他的脸色憔悴，黄里带灰，黑胡子下露出一排被香烟熏得蜡黄的牙齿。我想，或许是长期的夜生活把他折磨得这副模样吧。后来我才听说，原来他染上了吸毒的恶习，弄得这个颇有才华的人，陷于相当潦倒的境地。

胡先生把我的办公桌安排在室内的一角，他说我的工作就是为他和副主笔做些杂务，同时兼做校对，工作时间都在夜间。

我的服务对象——两位主笔，白天是基本上不来编辑部的，偶尔来一下，也只是各处转一转，看一看，就走了，夜里才正式上班。《上虞报》虽说是张小报，却是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”，各种文体都有，经常发表社评一类的评论，这些评论大都出自我的师傅胡师柳先生之手。胡师柳先生一家在上虞县颇有名气，他本人也是个名扬乡里的才子，夜间当他抽足了大烟，喝饱了浓茶之后，真是下笔如有神，洋洋千言，一挥而就，一篇评论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写成，我立即把稿子送到印刷厂去排，几乎不要再作修改就可上版。而另一位姓刘的副主笔就差远了。他比胡先生年轻，一身笔挺的中山装，头发梳得锃光油亮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报社社长、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刘某的亲戚，他本人也和国民党县党部有暧昧关系，显然是个有来头的人物。这位副主笔平时未曾写过什么文章，只是翻翻电讯稿，审阅来稿，有时修改一下文章标题之类。刘副主笔人倒还随和，与胡先生相处得也还可以，他对我这个新来的小学徒，说不清楚是疑惑还是欢迎，初次见面脸上几乎没有什么表情，只是冷冷地问了我几句，就扭头忙他自己的事去了。

两位主笔一般都要到晚上10点钟左右才上班，而我晚上8点多



钟就要开始干活,把屋子打扫干净,把稿子整理好分别放到他们两人的案头,还要给他们泡上茶。胡先生又喝茶又抽烟,他的茶要泡得特别浓,茶杯里差不多是一半茶叶一半水。他烟抽得很多,一上班桌上就放好两包烟,他边写稿边抽烟,一枝接一枝,一晚上下来,两包香烟抽得精光。

我收拾停当,就开始埋头校对,有文章,也有启事一类的广告。开始我不习惯夜生活,白天不想睡觉,到晚上工作的时候就打瞌睡。有一次,我校对的广告出了错字,刘副主笔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,因为广告出了差错,就要免费再登一次,这就给报社造成了损失。刘副主笔说,社长为这件事大发脾气,说以后再也不许出这样的差错。我心里十分紧张,为了避免出错,就学两位主笔喝浓茶,此法果然有效,瞌睡虫被赶跑了。糟糕的是,我在下班以后,睡在床上依然精神抖擞,久久不能入睡。

介绍我到《上虞报》工作的陈树谷,仍不时来看望我,来时总给我带些新的书报,和我聊聊天,告诉我一些国内外新闻。我就在那时看到了用土纸印刷的重庆《新华日报》,真如获至宝,密藏了起来。树谷喜爱写作,他以叶希为笔名,在报刊上经常发表文章。他也鼓励我学着写些东西。我鼓起勇气,写了几篇习作,有一篇竟然在《上虞报》副刊上发表了。我看到自己的文章白纸黑字地刊登在报纸上,文章下边端端正正地印上了自己的名字,真是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,立即把当天的报纸寄给了父亲。

时间过得很快,转眼已是1939年7月底。一天,陈树谷挟了一卷东西,急匆匆地来找我,他掩上宿舍门对我说:现在有一项紧急任务要你去执行。接着他告诉我,现在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复杂,国民党上层的对日投降派很活跃,企图与日本侵略者妥协,联合起来反共,抗日战争正面临着夭折的危险。这是一场关系中国命运的斗争。延安共产党中央在7月1日发表了《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》,提出了“坚持抗战,反对投降;坚持团结,反对分裂;坚持进步,反对倒退”的三大政治口号,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,坚决反对投降

阴谋。

“现在要赶快把党中央的七一宣言传达到广大群众中去，让大家都知道，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油印出500份，决定今天夜里派一些人散发出去。”陈树谷说到这里，朝我深深地看了一眼，又说，“我想今天晚上让你也去散发一部分，你能完成任务吗？”

“行，我能够把这件事办好。”我毫不犹豫地回答。我原以为他带来的是新来的重庆《新华日报》，这才知道是一卷油印传单。

陈树谷又叮嘱了我几句，就放下传单，匆匆地走了。

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是既新鲜，又神秘。我赶紧去弄来一些面粉，偷偷打成糰糊，装进了两个纸口袋。又把宣传品包好塞在枕头底下。一切准备停当，又凝神想了一下晚上的行动计划。

晚上我强作镇静，做完了本职工作。两位主笔不到12点钟就走了。楼下印刷厂的印报机咣咣当当地响了一阵，就没有声音了。那时《上虞报》发行量只有一两千份，用最古老的平板机印刷，一会儿就印完了。

我躺在床上，紧张地谛听着楼下的动静。大约到了凌晨两点钟左右，楼下已没有一点儿声音，整幢小楼安静极了，估计人们都下班睡觉去了。我一骨碌从床上跃起，把准备好的两包糰糊放进两边的衣袋里，再拿上传单，悄悄溜下楼来。我决定先奔本社的印刷厂。我想，得先让工人老大哥看传单，而且又近在眼前。于是我走进印刷车间，把几张传单放到排字架和平印机上，然后走出大门，来到街上。深夜的县城大街寂静无声，没有一个行人。我把一张张的传单贴到了店铺的门上。贴了大约几十张，我心头涌上了一个现在看来也许是幼稚可笑的念头：这里离县政府不远，我要把传单贴到县衙门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眼皮子底下去。那时候，小小的上虞县县政府不是什么大衙门，大门口根本没有人通宵站岗放哨，传达室值班老头儿也早已睡大觉去了，我毫无阻挡地走进了县政府，在一间间紧闭的办公室门上，贴了许多张传单，然后安全地撤退出来。

回到报社寝室里，我既激动，又兴奋，想不到这样顺利地完成了





任务,心想明天陈树谷来了,准会表扬我。人毕竟有些累了,我怀着胜利的喜悦,倒头便睡,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

我正睡得香,懵懵懂懂地听到有人在大声喊我,还不断推我的身子:“快起来!快起来!社长叫你去!”

我揉揉睡眼,坐起来问:“什么事呀?”

“还不快起来,社长叫你去。”那工友显得更不耐烦了。

我本来是和衣而睡的,起来就迷迷糊糊地跟着工友走到了社长办公室。社长亲自叫我去,想必一定有要紧事。

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刘社长一见我进来,劈头就是一句:“你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?”

这一问,我顿时清醒过来,便沉住气说:

“我哪里也没有去,我在睡觉。”

社长的一双黑眼珠透过他的金丝边眼镜片,滴溜溜地朝我身上转,打量了好一阵,发出一声冷笑,指指我的衣服说:

“这衣服上是些什么东西?还说哪里也没去!”

我低头一看,不觉一怔,发现在我上衣的前面,特别是两只口袋边上,全是一块块半干的糍糊痕迹。原来昨天深夜贴传单时,操作粗心,把糍糊沾到了衣服上,回来倒头便睡,没有换衣服。我狠狠责备自己粗心大意。虽然知道赖不掉,但我还是硬着头皮解释说:衣服是昨晚上班时弄脏的。

“胡说,还要强辩!”社长发火了,两只黑眼珠瞪得更怕人。“我已经把事情全查清楚了,还要强辩!看你到社里来平时做事还老实,想不到干出这种事!”

我低着头默不作声,显然再解释也没有用。

社长停顿了一下,黑眼珠转了几转,又发出了凶狠的声音:“社里不要你了,你给我走!”

我掉头走出办公室,回到宿舍收拾了自己简单的行装,也没有来得及向胡先生告别,离开报社,到上虞政工队找到在那里担任区队长的陈树谷,把经过情况向他说了一遍。他听了哈哈大笑,并没有批评

我。

后来我听说,那晚上的 500 张传单,在上虞这座小县城里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。使我至今弄不明白的是,那个国民党县党部的要人、老谋深算的社长大人,为何不进一步追究我这个小学徒的责任呢?

我在近半个世纪的新闻工作生涯中,曾三次被逐出新闻岗位。第一次我是高兴而骄傲的,如同小鸟飞出了樊笼。另两次却是痛苦的,那是 1958 年和 1968 年,我恋恋不舍地被迫离开了人民日报社编辑部。这是后话。

